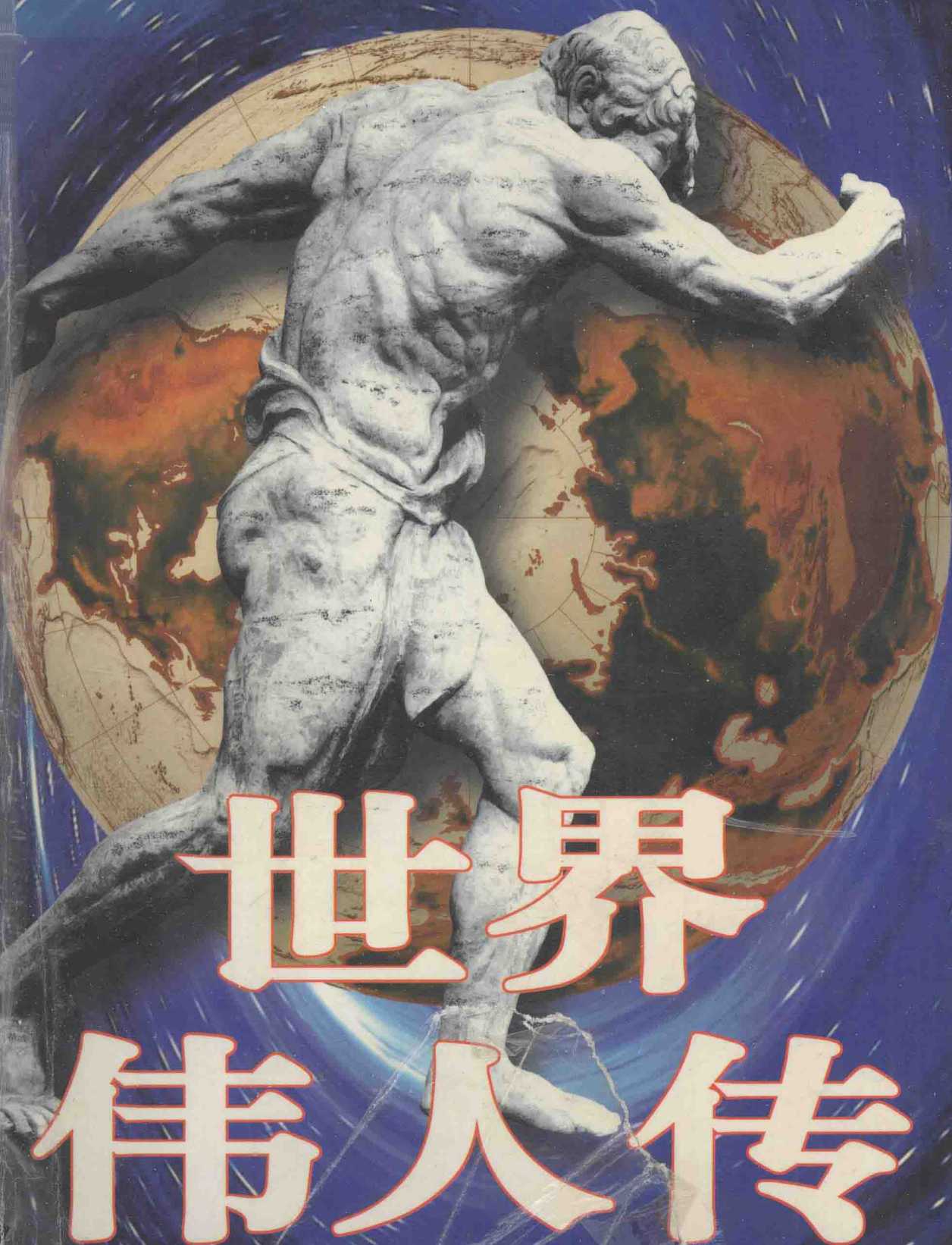


经济日报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世界 伟人传

世界伟人传

——二十世纪世界政坛伟人

梁国藩 主编

(下卷)

陕西旅游
经济日报 出版社

蓬皮杜

法国前总统

早年岁月

1911年7月5日，乔治·蓬皮杜在蒙布迪夫出生了。他生在蒙布迪夫，可是他的命运却注定在学校里。他不是蒙布迪夫直接的继承者，而是一个比市立学校还要高一级的成功者。他的父母都是教员，而且是教员中的佼佼者，他们要做教师，对于孩子，他们只有一种思想，就是使他成为大学教授。当孩子长到7岁的时候，有邻居问他说：“你长大了做什么？”

他回答说：“上师范大学。”他也不知道“上师范大学”是什么意思。

蓬皮杜三岁的时候就识字了。大人把他送到幼儿园，那里的老师杜朗小姐把他看作是一个奇才。当其他小孩还只会在院子里用泥土做馒头的时候，他已经需要看有插图的书了。

夏天，父母带他到家乡度假。但是他的城市，他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城市，和他最早的记忆有密切联系的城市，是阿尔比，是那座粉红色的城市，法国的佛罗伦萨。

一个使他的耳朵感到新鲜的名字，一个他最早听到的大人物的名字，就是饶勒斯。

当时，一轮充满希望的红日在阿尔比的地区升起，这就是让·饶勒斯这位长着大胡须的传教者传播的社会主义。

饶勒斯是和平主义者，老蓬皮杜是饶勒斯主义者，但他还是个战士。

乔治·蓬皮杜十四岁时就是一个惹人喜爱的、不同凡响的孩子。他细高个儿、脚步缓慢。浓浓的黑发，密密的眉毛，注视的、狡黠的眼神，常常流露出心不在焉的神色。

他生来聪慧，同学们都比他用功，但蓬皮杜的成绩却超过他们。

蓬皮杜从小就很有礼貌，不过喜欢取笑甚至讽刺，常对老师搞点恶作剧。知识渊博的拉加斯先生喜欢有问必答，蓬皮杜就设下圈套叫他

上当。蓬皮杜还在黑板上编写四行诗的绝句，结尾处都以谐音或双关语影射老师的姓氏。

同学们都觉得他和蔼、有礼，丝毫不因为成绩好而自负。同学们做不出作业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拿出来给他们去参考。他还是意识到自己是有才能的。

他对他的女同学说：“如果有人要我做一个小时有关中国夏朝的演讲，我也会毫无困难地不经准备就讲”。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也不卖弄自己和自己的才能。他不说一句话就能影响别人。他引起了很多女孩子的注意，可是他的眼睛里只有一个巴黎女学生。

宿舍里有一位女舍监为了讨他喜欢，什么都肯干。她向女学生说：

“星期四郊游，我们要走木屋街。”

“小姐，为什么要走木屋街呢？”

“因为乔治·蓬皮杜在那里等那个巴黎女学生。”

当女学生们走过的时候，乔治扒在窗口上看。过后，他骑自行车赶上她们，他在女学生前面先回到家里，再等着看女学生返校时从他家门口走过。

晚上，女学生郊游回来上自修的时候，乔治爬到窗口张望那个巴黎女学生。

有一天，他穿上那个巴黎女学生一位女朋友的大衣、半筒靴，戴着她的帽子，来到会客室，请求会见那位来自巴黎的住宿生。女看门的觉得他的样子不大对头。他尖着喉咙说：

“我是她妹妹！”

女看门的端详着他那装模作样的样子，嘟囔着说：“作为一个巴黎学生的妹妹，你的样子可有点特别！”但是她还是去通报了。

在第二次中学会考时，那位巴黎女学生从距离二十米的座位上向乔治送来失望的秋波。他用蝇头小字在一张粉红色稿纸上写了一道题目的答案，揉成一团，飞快地弹了过去。

教师看见一个粉红的纸团在自己面前飞过，立即向着发射的地方转过身来。全体考生都在埋头做自己的考卷，乔治有意地向别处转过

头去，纸团飞过去了。通过眉目传情，求爱者继续鼓励对方。

那个巴黎女学生在哲学考试上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分数，但是依然没有通过考试。而乔治会考是过关了，但是没有分数。

不久，在他十七岁那年，他向惊愕万状的父母说他要结婚。不过，他们的激动不久就过去了，因为很快就从巴黎传来了坚决反对的声音。那位巴黎女学生的父亲，是一名教授，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这个男孩是一个善耍小聪明的懒虫，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调皮捣蛋鬼，将来不会有出息的。”这是那位教授对他的评价。

1930年10月初，乔治·蓬皮杜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从奥斯特利茨车站下了车。他不久便要和高材生，经过选拔的外省各大城市的学生——全都是经过考试，优秀奖的获得者、会考的胜利者——进行竞争了。

大学预科是一所寄宿学校，大家在激烈的竞争气氛中紧张地准备着大学考试。但它又是一间温室，里面都是些热情的青年人，如火如荼地渴求各种知识。

蓬皮杜曾说过：“我最大的过失就在于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即使在课间，吃饭时间或晚上召开的讨论会，蓬皮杜都一律参加。会上无所不谈：诗的精髓、唯名论、灵魂的存在等等。他参加讨论的次数比任何人都多，因为他好像没事可干。他那漆黑的眼神带着讽刺的神色，给会场带来烟雾、自由思想者的谈谐、青年人的权威。他并不强迫别人发言，而是把离题的讨论引回到问题的实质上来。

事实上，他不大发表自己的见解，听得多讲得少。在群众的争论中，他的态度很像英国人那样冷漠，表现出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一般所没有的那种分寸和稳健。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他的同学桑戈尔后来叙述道：“我欣赏他那种能消化一切、能一眨眼就领会一切的聪明，还有他那老老实实地求学以及坚强不屈的正直性格。他那种一学便会的特点，令人见了多少有些不好受。在考历史的

前夕,他用一小时看了一遍历史书,嘴里一面喊着“烦死了”,一面站起来,离开了自修室,跑出去抽烟,回来以后就全神贯注地读起吉罗杜的小说来。我心里想他未免太过分了,但是老师收回考卷时,却又是蓬皮杜考第一。”

他的很多同学在态度上表现出远大的个人抱负,可是蓬皮杜的表现是“谦和地、审慎地享受现实,他的这种态度使周围的人感到惊奇。他跟秋波传情的年轻姑娘们一块出去玩的事从来不对任何人讲,但姑娘们都夸耀自己的胜利。蓬皮杜对少女向他卖弄风情的事守口如瓶。朋友们见到他头脑那样的灵活,从他擅长翻译希腊文和拉丁文,一直到历史、诗歌、戏剧,他都是那样地应付自如,无不心服口服。”

师大一年级忙于准备学士考试,二年级是最轻松的一年,三年级将是师资会考。

会考的日子到了,他比别人提前一小时交卷。“这样草草了事,将来要吃大亏的。你真的那么有把握,连再看一遍考卷都不需要吗?”一位监考的老师问他。

“磨时间没有用处!”蓬皮杜回答说,一面走出考场,一面从口袋里取出一根“乐根”牌香烟。

结果,他考取第一名,文科第一名。

“先生,没办法,我们只好让你得第一名。不过我们非常遗憾,因为在全体师范生中,你是最不用功的!”考试委员会的一位主考这样对蓬皮杜说。

1935年10月,乔治·蓬皮杜被任命为马赛圣夏尔中学法文、拉丁文、希腊文教师。

蓬皮杜对不留心听课的学生很不客气,往往弄得他们很难堪。他上课与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同,非常引人入胜,但看上去并不严肃。下课以后,学生们对新老师的态度议论纷纷。

“这不是一个职业教师,”有人说,“后来学校请不到教师,所以不得不找一个记者来应付。”

“无论如何,他对卖狗皮膏药可不是门外汉,而且根本瞧不起人。”

他改作业也令人惊讶,只在几个最严重的错误上用铅笔画几道,在边上批上两三个字,往

往用的是讽刺语。

不过这种完全靠口头讲授的教学法,生动活泼,说明这是根据仔细推敲得出来的经验。这位教师虽然改作业敷衍了事,但在课堂上却对每一个学生的功课都提出精辟的见解,击中要害,往往毫不留情。所以,省督学对第三班甲组学生的丰富知识感到惊奇。这一班学生期终考试成绩优异,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升入第二班。

1938年,乔治·蓬皮杜被调到凡尔赛中学,在他前进的路上,这是一次跳跃。凡尔赛中学是一所著名的学校。但是象从前一样,运气又来帮忙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凡尔赛宫附近找到房子,巴黎亨利第四中学的一位文学教师因为学生起哄,提议要和他对调工作。

二十七岁的青年教师竟然在法国第一流中学里得到了教师的席位!

1939年8月,蓬皮杜在意大利边境阿尔卑斯步兵第141团后备部队服兵役。他会说德语,因此被派在马奈斯上校身边做情报官。

有一天,大家在军官食堂吃饭的时候,一位军官问马奈斯上校:

“上校,如果您受了伤而又没有军衔较高或者资历较深的人在场的话,您指定谁来代替您呢?”

“蓬皮杜。他是一块磐石!”

这是这位未来的总统第一次被人视为“继承人”。

法国被占领后,军官立刻就分为两派,一派是维希派,一派是抗战派。蓬皮杜中尉是围着6月25日捡到的一架收音机听伦敦广播的人中间的一个。他马上感到自己是一个戴高乐派,许多人抑郁不安,但是对他来说,一切都不成问题,他从内心深处确信德国一定会垮台。

他激烈地反对那些站在贝当一边的上司,和他们断绝了一切关系。他暗自思忖是不是应该到伦敦去找戴高乐。“伦敦人”的作风和语调征服了他,他无法想象这个人面貌如何,但是在电台上的戴高乐就是希望的声音,挑战的声音啊。

“我永远不会相信,”他后来写信给他的一

个朋友说,“法兰西将沦为弱小的国家,象西班牙那样走向没落!”

1944年8月,武装起来的巴黎起义了,一些居民带着武器到他家里来找他。他们一起去包围军事学校,看见院子里和窗口上穿绿色军服的人就开枪。

蓬皮杜弄到一辆小卡车,准备参加袭击巴黎警察总局的战斗,可是警察局里的警察起义了,升起了洛林十字旗,战斗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在慷慨激昂的人群中,蓬皮杜看见戴高乐将军从香榭丽舍大街上走过来,这是一个不能不使人感动的场面。阿尔比人热泪盈眶,这在他一生中是难得的一次。

乔治·蓬皮杜和群众分享这种兴奋的心情,大家都在谈论即将成立的真正的、永恒的新共和国。蓬皮杜兴奋之余决定抛弃教书的工作,他要投入战斗。到什么岗位上去呢?他也不知道,但肯定是跟着戴高乐……

后来,米歇尔·德勃雷把他介绍给戴高乐将军。他被派到国防部任办公厅副主任。蓬皮杜还不知道将要担任什么新的工作,也不懂得什么是办公厅,于是,他写信给布鲁耶,向他吐露了自己的心情。

这时,戴高乐将军把布鲁耶叫去,对他说:

“我要和大学打交道,我需要一位有大学出身的人负责和教育部联系,一位会写文章的有教师资格的人。”

“你是有教师资格的,而且会写文章。从今天起,你就是将军办公厅的人。”布鲁耶对蓬皮杜讲。

蓬皮杜在香榭丽舍大街只是远远地看到过戴高乐。现在和这位民族解放者在一起工作,确是富有吸引力和激动人的。他的主要工作是制订教育改革方案,不久,又负责和新闻部取得联系。接着,他在内政部当上了布鲁耶的助手。他为自己现在能有机会为一位众望所归的人服务而感到高兴。

蓬皮杜对戴高乐着了迷,他一生中没有想到跟戴高乐在一起工作更感到自豪的了。还

没有接近戴高乐时就已经着了迷,这无疑是由于复兴祖国的爱国心,但也是由于对文学的爱好。这位震动全国的神话般的人物,对他来说,简直是荷马史诗中的一位英雄。

没有多久,临时政府的首脑为了支持巴黎科学院的一次开幕典礼,召见担负国民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因为这个负责人要跟他一起去参加典礼。这次接见蓬皮杜的戴高乐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开朗的、和蔼可亲的将军,只有在接见他认为是努力工作的人,他的态度才这样的和善。这位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只用了五分钟就把有关大学目前的思想状况,将会遇到什么人以及开学典礼的仪式等,简单扼要地向戴高乐作了介绍。戴高乐将军听了介绍后很满意,不过并没有作声。

此后,蓬皮杜曾多次被政府首脑叫去一起工作。戴高乐好像很欣赏他,欣赏他善于抓住问题实质的能力、工作兢兢业业,提出的意思具体。

写政治时事摘要是锻炼文笔的好机会。蓬皮杜善于选择一些需要报道的事实,善于写简洁的文章,善于写摘要。总统办公厅里像这一类公文往往有披着一层乐观面纱的倾向。蓬皮杜则不然,他客观地、坦率地、具体地把一些糟糕的事实统统写到摘要里。天知道,在这个政府刚刚成立,新官上任,什么都缺,共产党参加政府后到处企图争夺领导权的时期,还会没有糟糕的事情。

1946年1月,选举后在议会里出现了反对戴高乐所主张的宪法的集团,戴高乐将军突然在内阁会议上简短地宣告他将辞职。他向惊异万分的部长们表示感谢。

乔治·蓬皮杜轮到最后。

飞黄腾达

1958年6月1日,乔治·蓬皮杜正式成为

夏尔·戴高乐总理的办公厅主任。

但是戴高乐远远不止是内阁总理，他是唯一负责宪政的人。他被授予全权——集政府和议会的权力于一身。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戴高乐的办公厅主任绝不是一个负责传达的官员，也不是传统的内阁总理手下的亲信。虽然蓬皮杜的官衔只是一个办公厅主任，但他类似总统的国务秘书，也有点象内阁副总理。

蓬皮杜名义上只是一个几乎不出头露面的办公厅主任，但他却拥有一种特殊权力，他可以以将军名义说话。人们不能直接请戴高乐听电话，而必须由他所信任的蓬皮杜来传话。蓬皮杜具有极大的便宜行事之权。

但是这种非常的权力，是要靠外交手腕来行使的，因为这种权力超出第四共和国时代的许多内阁总理，而部长们又不认为一定要服从它。蓬皮杜访问过许多前任总理，为了实现戴高乐需要的全国统一，同这些人的合作是必要的。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据说蓬皮杜还得在尊敬的共和国总统勒内·戈蒂和将军之间充当一个缓冲的角色。

戈蒂总统虽然对戴高乐非常钦佩，并且还是他帮助戴高乐取得政权和事先就决定由戴高乐继任他的职位的，可是他毕竟是一位精明、尽责的国家元首，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在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他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即使在一些细节上，他都要仔细过问，对于内阁总理不耐烦的表示，他似乎视若无睹。乔治·蓬皮杜竭力和颜悦色地设法避免触犯勒力·戈蒂的敏感，让他有时间预先去字斟句酌，同时还小心翼翼地防止他没有参加内阁会议而发生的矛盾。

安德烈·马尔罗说：“对于戴高乐，蓬皮杜就等于那位不可缺少的参谋贝蒂埃，拿破仑加上贝蒂埃，一切战役都能够得胜。”蓬皮杜主要的优点是善于决断，面对一个问题，他非常善于毫无偏见地提出确凿的论据。毫无偏见，这是重要的一点，鲜明的论据能使问题获得解决。

很少有人怀疑，和蓬皮杜打交道就是与一位专家打交道。早在十年前，他和米歇尔·德勃雷、雅克·福长尔一起编制的国家编制第13号

文件，就已吸收了将军在贝叶演说中曾经阐明的观点。他早在法兰西人民联盟时期就参加过有关宪法问题的长期争论。

负责制定新宪法并提交由公民投票来决定这个政府内的冲突，主要是戴高乐将军和居伊·摩勒二人之间的无声斗争。

特劳盖·奥里约以及其他社会党人只是对戴高乐含糊其词地表示同意，他们拒绝戴高乐提议的议会休会两年，只同意他有六个月的全权以制订新宪法，而法国社会党领袖则赞成给予将军以为期两年的全权去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但是不给他以任何制宪的权力。

两年期满，阿尔及利亚事件结束了，戴高乐就该把位置还给第四共和国。

但是法国社会党领袖的朋友们决不让步，他们作出了不同的决定，将军则巧妙地采取了另外的措施。议员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席位。他们要求议会能够永远有权确定立法选举的方式。戴高乐对这个要求表示愿意接受，这就使他们非常高兴。就这样，他们投票通过了戴高乐的制宪权，但没有问一问他们的选民对戴高乐是否比对他们更加信任。

居伊·摩勒认为，这个得到最高行政法院支持而制定的新宪法，它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向国民议会负责的问题。如果内阁可以被推翻，那么这就是共和国制度，如果不能被推翻，照他看来，这就是独裁制度。

对于他的愿望，戴高乐还是很乐意地赞同的。他完全同意议会可以推翻政府。只有这么一条修正案，这在过去的宪法中也是规定了，即在议会对政府投不信任票以后，议会可以解散政府，并进行新的选举。

但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府在提出信任问题时，通常要由政府证明它在议会中是得到多数支持的。内阁总理常要花费大部分时间去奔走于议员之间，争取他们对他投信任票。

在这个讨论中的新条文里，却规定由国民议会来证明议员中是否多数是反对政府的。议员们应该提出弹劾案。在弹劾案交付表决的时

候,议员们知道政府首脑已处于少数派地位,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把是非曲直交由选民判断,这样,议员们就有失去席位的危险。

戴高乐认为,投票者有所畏惧时,就会开始变得明智起来。

将军和社会党人的国务部长之间,观点完全不同的地方,正在共和国总统的职权上。

戴高乐,这个对于权力有一个军事观点的人,认为总统即是老板,就像美国一样。总统本身就代表行政权。政府的首脑,就是他。不是一个由议会选出并授予权力的总理,而是只有一个由共和国总统授权并完全从属于他的内阁总理。

居伊·摩勒则认为,权力应该属于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总理,否则就会出现悲剧。如果议会解散,如果选民把反对政府的多数重新选进议会,那么,总统不是服从就是辞职。无论如何,这是总统和议会之间一场公开的战斗,它有导致独裁统治的危险。

米歇尔·德勒雷要加强总统权力,并降低内阁总理的作用,使其只成为一个单纯的执行者,竭力把这样的条文塞进宪法中。居伊·摩勒则为了把一个做摆设样品的总统重新放在壁炉架上,使内阁总理成为行政首脑,而不是单纯的执行者,于是在每字每句上展开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咨询委员会的会议没完没了,为满足双方的意图而草拟的条文总是模棱两可而且永远是有争论的。

但事情总得有个结束。蓬皮杜找到了一个办法。8月间,经过许多参加制宪的人精疲力竭地大大争辩了一整天之后,一个为数不多的人组成的委员会才在晚上10时开会。

蓬皮杜为人善变,是最讲现实,最讲实惠的人。他在银行里编过一本诗集,通过优美动人的篇章表现了诗的精华。他是一个穿着睡衣,在家里墙上糊花纸的家长;是一个在作家兼拍卖估价员莫里斯·兰斯和画家高科尔迪埃之间的审美者;是国防委员会将军中的一位军事家;是一个喜欢享受,爱好戏剧,欣赏妇女的美、考究的衣服,喜欢各种艺术各种时髦的人。他热爱柏拉

图,从希腊文来读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他特别喜爱朴素无华的景色,他在洛特省旷野地区购置了一所荒废的田庄,跟他的妻子、亲近的朋友作为一个勤学的农民在这里的羊群中度过闲暇的时光,有时下下棋,有时到荒地里去散步。

他的朋友曾说:“他不是公职人员而是一位政治家。他对国家的非凡的观点使戴高乐为之惊奇。他是一位官员,却不是传统的演说家。他不喜欢对议会中的常客讲话,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在议会讲坛上,他使过去议会中的雄辩术、修辞学都成为过时的东西。”

战斗重新开始。蓬皮杜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其实,议会派和戴高乐派对政府结构本身的意见差不多是一致的。在如何运用这个结构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却是对立的。没有任何人怀疑,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只要“自由法国”的领袖当国家元首,就总是一个老板。因此,对职权必须加以规定,以便将军能够运用并且完全适合另一位新总统。这就是说,对于能够引起争论的地方要定得含糊一些。善于玩弄文字的蓬皮杜把折衷的、不明确的词句引用到有关的段落中去,终于使每个人都可以在深夜一点钟去睡觉。这些不明确的东西使总统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样都可以接受,这就给了法兰西人一部简要而含糊的宪法。这部宪法正如蓬皮杜所说:“在运用者的手里才能明确起来。”

1959年1月8日,将去就任共和国总统职务的戴高乐将军在乔治·蓬皮杜陪同下离开总理府乘车前往爱丽舍宫。

在二十一响礼炮的雷鸣声中,戈蒂总统把他的权力移交给戴高乐将军。

两位总统一同通过香榭丽舍大街前往星形广场向无名英雄墓致敬。戴高乐将军和戈蒂总统在凯旋门下分手告别。

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返回爱丽舍宫之时,在戴高乐乘坐的官方汽车里,坐在左边的是乔治·蓬皮杜——一个为群众所不熟悉的人。他的位置本来应该由参议院议长、共和国的第二号人物来坐。

庆祝典礼的一切仪式都是由戴高乐本人规定的,在官方人士中,人们就戴高乐将军把这种无上的光荣给予在那一天陪同他完成任务的内阁办公厅主任这件事,提出疑问。

为什么不是参议院议长呢?因为两院还没有来得及选举议长。

但为什么不是即将担任总理的米歇尔·德勃雷呢?正是因为米歇尔·德勃雷当时还不是总理。因为每当举行传统的庆典时,国家第二号人物还没有出场,因此将军认为有必要把这个位置给予在革命时期——那天是这个时期的结束——他的得力助手,以此表示敬意。

蓬皮杜惶恐不安地担心这个分手的日子。他要回到“私人企业”的安静环境中去,让戴高乐去应付处在极为动荡不安中的阿尔及利亚,去对付这些严厉措施所引起的人们的不满和退伍军人的示威游行……

确实,蓬皮杜事先约好从5月27日起,只在将军身边待6个月。然而他心里很难过。这可能是一次永别。他害怕“遗弃”这个难听的字眼,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他将失去同具有魅力的人每日接触的机会了。

有些人认为,新的国家元首在建立他的第一届内阁时,打算确定他的最亲近助手的职务——一半是内阁办公厅主任、一半是总理,像以前他在总理府时,在戴高乐手下实际上所起的作用那样。

但是对共和国总统来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同议员们有过相当多的斗争。对议会负责的政府首脑应当是一个议员。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有一项艰巨的工作要处理。可以使人放心的总理应当是一个热心支持“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主张的人。这位在“横穿沙漠”时已是戴高乐派的孜孜不倦的演说家的米歇尔·德勃雷,既是议员,又是“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主张的热心支持者。

将军曾邀请蓬皮杜担任财政部长,已经话到嘴边,却没有强调地讲出来。他甚至没有请蓬皮杜出任总统府秘书长,这一位置,有人曾建议他留给他的办公厅主任。

在总理府中充当戴高乐得力助手的蓬皮杜过于有本领,过于重要,过于熟悉政权——但蓬皮杜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人物——虽然具有微笑的外交家的外表,也难免和总理的个性发生冲突。财政部的强大的吸引力把所有的重大问题都吸引到它那里。财政部长在决定同意或拒绝向各个部拨款,在审阅所有的案卷时,周围都是高级官员,俨然是部长的太上皇。乔治·蓬皮杜在总统府中地位之微妙并不亚于财政部。不管愿意与否,所有的案卷都得送到他那里去。

蓬皮杜对将军说“最好让我回到‘私人企业’去,这在我们之间原约定了的。”

戴高乐回答他说:“我感到遗憾,但我了解你的理由。而且我们会重新在一起工作。我们总有机会!”

这是一句告别的话。

乔治·蓬皮杜离开了纷繁的总统府。从这几句话里使他感到将军并不怨恨他——不太怨恨他——有一天还会召他来一起合作的。

蓬皮杜回到总理府,去完成最后一项任务。他应该把总理的职权重新移交给米歇尔·德勃雷——他是戴高乐政权的首任总理,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而且是能够充分行使职权的总理。总理府,他在这里曾经度过不平凡的六个月,现在几乎是空无一人了。他的心情是抑郁的。他恢复了自由的生活,然而每天不和戴高乐在一起,不免感到若有所失。

第二天,他在巴黎闲逛。街上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在将军身边度过6个月,管理国事,然而却没有一个法国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一个法国人认识他的面貌,他为此而感到高兴。

戴高乐将军感到——但并不显露出来——他的办公厅主任同他分手的坚决。有人传出一些挖苦说和玩笑说——将军即使对于最亲近的人也并非始终是心软的——使人们想到这次分手使将军很难过。当有人向将军建议让蓬皮杜担任财政部长时,他这样说——当然只是传闻:“啊,蓬皮杜?他更喜欢到路特希尔德银行去挣钱去!”

玩笑话?失望的友谊?两个人都是一样的

神秘人物,为了谨慎起见,他们都掩饰他们的痛苦感情。戴高乐经常背诵的诗句就是《狼之死》中的一节:“忍受痛苦,默默地死去……”

“永不辩解,永不抱怨”,伊顿公学的绅士们所信奉的这句格言也让蓬皮杜奉为座右铭。

是不是说如果蓬皮杜同意的话,从1959年起他就可能担任总理呢?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挑选米歇尔·德勃雷也是很自然的。

1962年4月13日,乔治·蓬皮杜被任命为总理。

一位部长说:“戴高乐根本瞧不起我们,所以才派他的秘书来领导我们……”

对蓬皮杜的出任总理,不了解内情的人首先感到惊讶:蓬皮杜是法国第一任既非议员,又非前任部长,也非“政界人物”的总理。

有人说,戴高乐把他1958年的原办公厅主任安插在总理府,好象又回到5月13日文件以后国民议会授与他全权的时期了。人们还说,这是向总统专权制度迈出了新的一步。它又一次证明,公民投票只是一种巩固独裁的全民表决而已。

后来担任法兰西总统的密特朗的朋友们这样说:“在米歇尔·德勃雷任总理时期,戴高乐似乎还讲点民主:德勃雷是参议院议员,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蓬皮杜则不过是体现了君主的随心所欲”。

他又是一位无法比拟的朋友,很重视友谊,他的一部分力量就是从友谊来的,有一颗赤诚的心。他在总理任期内突然来到医院看望一个贫穷失业的生病朋友,使所有的病房都感到惊讶。但是他却是个多疑的人,不易接近,他经常保持警惕,不让人阿谀他,逢迎他,喜欢做一个幕后谋士,既不相信记者,也不愿意受到他们的欢迎。

他是一位克尽职守,有责任感的公务员,严于律己,令出必行。他以荷马的英雄人物为表率,忠实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他比任何人都更能适应戴高乐派的思想体系;他还是个精明的政治家,当部长们不耐烦的时候,他懂得要放宽,在关系紧张的时候,他懂得要缓和。他工于

心计,但忠诚正直,对政治上的卑鄙手段容易发怒。

人们把蓬皮杜看作是“法国的肯尼迪”,他的朋友说:“作为政府要人,他过于善良,过分礼貌,过分解脱了。他从不象克里孟梭,不象戴高乐那样,生来就带着荣誉和顽强的统治欲望。”总统府一位官员说道:“如果他做了国家元首,最难办到的就是再找一个蓬皮杜当总理。”

又有人补充说,将军选择的不仅是一个不了解议会程序的人,而且是路特希尔德银行的总经理,也就是说,从原则上讲,这是法国最不得人心的人,所有的“反对派”都会反对。

蓬皮杜在师范大学时的一位老同学却说:“只有戴高乐才有胆量做得出,不认识乔治的人不可能对将军选中的人表示欣赏。”

“在美国,这样的任命是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美国总统在国会之外寻找助理,他在实业家、法学家、名教授中进行挑选。而在法国,我们还不习惯兼有总统制和议会制的1958年宪法。”

蓬皮杜是以和蔼可亲的非职业政治家的名声上任的。他接待他的部长们的态度首先证实了这个印象,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使部长们十分高兴。

在德勃雷执政时期,重要的案卷都有两份,部长有一份,总理也有一份,而且总理的一份材料更丰富更详尽,部长来见总理,会发现他已经把要讨论的问题作出了决定,德勃雷事先已经知道对方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他的神态显得很专心,但是耐不下心来。一听到和他意见相反的陈述,他的腿、他的胳膊、他的上身以至他的全身都“表示反对”。最后是总理口授指令。

而蓬皮杜却对他的部长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可一点也没有替您作决定的意思来干您这一行。”

但是,他的合作者在日常工作中却发现了一个和外界传说完全不同的人物。

开会时,总理让每个人发言,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对自己不懂的问题从来不开口,他尽量让别人发表意见。他躲在熏得他眯

起左眼的香烟的烟雾里,有时仿佛心不在焉,然而在一个小时甚至六个月之后,他会拿出一长串数字来,那是他在似乎陷于沉思的时候记下来的。他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

还有一件惊人的事:他有很强的接受能力,他像水泵那样去汲取知识。

一位部长说:“乔治·蓬皮杜进行探索工作,象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运动员一样,采取分段进行的方式。他要花两年时间来学会掌握国防事务……”

一位熟悉内情的阁员反驳道:“完全不对,他一上任就像一位法官那样钻到国防部的预算中去了。第二个月,他又着手研究第二次计划拨款法案,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透露过消息。”

总理解释说:“一般来说,我的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的。”

“首先,我总的了解一下问题,并不急于解决。我先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从中找出主要实质。一个复杂问题往往可以归纳成两、三个要点就行了。”

“然后,我尽最大的努力向有关的负责人解释要点的内容,通常总是根据这些要点作出符合逻辑的决定。”

“第三个阶段是:在进行这些讨论时,我有充分的时间考虑,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明确的意见,于是决定一个原则,并且坚持下去。以后除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以外,什么也不能使我改变主意。”

“当然,执行决定的办法可以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这样,在周围的人中间便逐渐出现了总理的真正形象,同他们以前想象的激进党的忠厚长者是有天壤之别的。

这是一个对理论、空想和思想体系无动于衷的、讲究实际的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能使对话者感到无拘无束的外交家,他希望他们一切称心如意。总之,和戴高乐将军比起来,他还是乐意帮助别人的。不过,蓬皮杜的友好的眼光有时在香烟的烟雾里会突然

变得相当严厉、无情,那是他的敏锐的目光在观察周围的人某些活动的真正动机。

这是一个细腻的人,他对于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都非常敏感,对粗鲁、庸俗和政治上的虚伪容易反感。他那严肃的本质表现为顽强的决心,不过隐藏在朴实和愉快的外表下,不易觉察罢了。

这是一个柔中有刚的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尊重自由,关心社会正义,随时准备帮助别人,喜欢做圣诞老人。

法定制宪人戴高乐将军在1958年使议会通过一部措辞含糊的宪法。对这部宪法,一开始就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拥护传统的共和国制度一直认为这是执政政府的议会体制。这一点戴高乐将军也承认,总理应当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总统只应当是仲裁者。

但是政府应当有足够的方法对付议会的一意孤行;议会如果推翻内阁,政府有权解散议会,付诸全民投票,使政府为了保持稳定而拥有打击力量和起决定作用的威慑力量。

戴高乐既不愿意成为英国女王,也不允许议会把一位总理或一党的意志强加给他,因而他召来了乔治·蓬皮杜。

随着蓬皮杜的到来,仅在实践中存在过的“保留权力范围”很快就消失了。在国家元首和当了总理的前办公厅主任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合作关系。

蓬皮杜是以一个门生来找老师的心情上台的。他和戴高乐意见完全一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保留权力范围”,他和总统在所有的范围中都进行合作。

他不是一位政治家,不需要表明自己是个与总统有别的实体。登上前台演出,他甚至觉得难受。他本来是戴高乐将军的幕后谋士,他很乐于担任这个角色。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个性。他个人办事既有魄力,也能服从自己上级的领导。他甚至和戴高乐一样,有军人的等级观念!这也是实业界的等级观念。

他对这位能够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将军的高超智力深为钦佩,而且比任何人都更了

解他。在他看来,戴高乐担任总统是国家的幸运,因此他从来没有想到应该限制总统的权力范围。他是为了在一切问题上尽最大的可能和戴高乐进行密切合作而来的。

对蓬皮杜来说,事情很简单,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他和将军共同执政。如果他和戴高乐将军意见产生不一致时,他只有一个选择:不是服从便是辞职。

当戴高乐将军没有征询内阁的意见,便突然对多国的欧洲,对“欧洲一体化”问题,采取了引起人民共和党的部长们辞职的立场时,蓬皮杜也没有起来反对。

在儒奥将军事件上,蓬皮杜提出过辞职。

蓬皮杜就任总理前三天,最高军事法庭判处阿尔及利亚“军事暴乱”副司令、原空军指挥官儒奥将军死刑。儒奥将军在看守严密的监狱里,对期望可以得到赦免已不存幻想。

1962年5月23日,判刑的最高军事法庭在审判4月18日逮捕的“秘密军队组织”和1961年暴乱的最高首领萨朗将军。判决是出人意料的:免于死刑,终身监禁。

戴高乐对此暗中生气。他认为对萨朗从轻量刑,就是以某种方式使军人叛乱合法化,就是同意赦免或者不处分服从萨朗命令的叛乱军官和恐怖分子。

总统仍决心处决儒奥,免得将来审判恐怖分子时,执法者援用总统对首犯的宽大。

蓬皮杜坚决反对处决儒奥,他不是以法学家的身份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是以一个普通人和政治家的身份提出这个意见的。

他的观点是,判决萨朗之前,即使把儒奥枪毙十次也不为多。判决没有执行,这是因为人们等待着判处萨朗将军的死刑,要让叛乱的最高首领用他的生命来抵偿用他的名义犯下的罪恶。

萨朗免于死,儒奥的处决就变成是代人抵罪了,这是违背道德的。

儒奥将军从狱里写出一封信,承担了叛乱和恐怖行动的全部责任,号召他的部下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并请萨朗将军也作同样的声明。

乔治·蓬皮杜决定发表这封信。

最后,总统要在司法部长提交的有关可以上诉的文件上签署意见的日子终于到来。

蓬皮杜陪同司法部长来到总统府。

蓬皮杜把所有应该宽大的理由陈述了一遍。话里的意思是:如果不能说服将军,他宁愿辞职。

如果他生气,也只有他亲近的人才看得出。这时他面色发白,眼神严峻,象一道光那样强烈。他很少粗声大气地讲话,对于女秘书也从不疾言厉色,然而他是一个专权的暴君。

他的朋友莫里斯·兰斯曾说:“这个人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是一个象树木那样的人,象山洞那样的人,上面有一层苔藓,深处有阴暗的壁洞。也是一个用水果象征的人。面孔上表现的是单纯、饱满和丰腴,实际上是个使人不安的多疑的人。有些人,让人看了发冷,但又感到安全可靠。”

他好象是和弗朗索瓦一世、拉伯雷同时代的人,是七星诗社的人,文化水平很高,热爱诗歌,喜欢绘画、音乐,酷爱一切美丽的东西,生来熟悉外交和政治事务,既爱享乐,又爱冒险,而仔细谨慎则象一个佛罗伦萨的王公。

一个大家都熟悉而又不为人了解的人,很难和他推心置腹。没有人能象他那样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谈论最复杂的问题,办公室里日常生活中的电话,他一概不接。他自信心很强,相信自己的命运,一切保密,首先对有关自己的事保密。难道这是谨慎、谦虚、假装的腼腆、艺术家的敏感么?他是一个不存幻想的心理学家。用不着跟他解释,他明了一切。他熟悉事物的动机,具有巫术家的直觉。

有人对蓬皮杜的情趣产生怀疑。他的办公桌上没有一张纸,没有一件公文,只有一包烟,给来访者的印象是无事可干。以懒惰闻名,完全没有说错,他是经过长期培养的有解脱精神的闲散人物。

但是空无一物的办公桌正足以说明他的工作方法,一种非比寻常的工作技术。他要看公文,公文立刻就到,而且附有注释。他的答案都

是现成的，工作速度比别人快四倍。公文边上批一句话就解决问题，马上就退了回去。总理的办公方法，是永远不让桌子上的头脑里有何积压的东西，他要为自己制造空闲。

人们在他身上发现的另外一种情趣是他长期以来所标榜的没有个人野心。有人说：“只有有一种深思熟虑，不择手段的野心，才能如此有把握地只需跳几跳就从中学教员跃到国家元首的位置上。”

蓬皮杜自己说：“我一生中，自己拿主意不过只有三四次，结婚、离开大学、为戴高乐将军工作、脱离政府机关和政法进入私人企业，其他都不是我自己作主的。”

然而，第三天，蓬皮杜通过总统办公室获知戴高乐将军不反对受理上诉。这显然意味着儒奥将军可免于死刑，他也没有辞职的问题。

几天以后戴高乐将军向蓬皮杜解释了他如此决定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呢？

据说，戴高乐将军实际上是强迫自己同意不执行判决的，对国家来说，这是姑息养奸，他衡量了姑息的害处，也衡量了总理辞职对国家造成的不利，觉得后者大于前者，于是只好同意。

那么，在总统府和总理府之间，特别在所谓“保留权力范围”里，责任是如何分担的呢？

乔治·蓬皮杜上台时，军人和外交家倾向于把他们的文件直接送往总统府。

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对军队所进行的全面改组，需要作为国家总管的总理的帮助，需要他在议会面前为正在进行的工作辩护。由于得到将军的信任，蓬皮杜不费周折就进入了国防最高“核心”，同其他高级文武官员一起，参预总统作出的决定。

总理为研究外交政策花费的时间也比较多。虽然自戴高乐把乔治·蓬皮杜召进决定重大问题的核心以后，已经不再存在“保留权力范围”的问题，但是还可以看到，在蓬皮杜任总理初期，外交官员倾向于把他们的文件在送总理府以前，先送到爱丽舍宫去。

局外人可能认为，是国家元首独自领导对

外事务。除了外交以外，戴高乐将军对任何领域的事务都不关心。无可争辩，他是领导最近一次世界大战的几位巨人中唯一在世的人。谁也不能以如此有限的手段在外交上造成这样大的声势。

然而，蓬皮杜很快就变成了总统府酝酿全球战略的密切合作者。对外政策是戴高乐将军和总理几乎每天商谈的主要题目之一。每当欧洲问题、布鲁塞尔谈判、多边力量等问题成为当时主要的课题时，蓬皮杜就到议会或者新闻界中进行活动。

在这方面很难看出哪些是总理的活动。过去，德勃雷在对外政策上也有他自己的观点。而他的继任者除了戴高乐的政策以外没有其他的政策，他和总统密切合作。

戴高乐以一贯的无畏精神对付所有的危险。蓬皮杜是“既然非如此不可，那就这样算了”。但是他仍然拿出全部精力，特别协助埃德加·皮萨尼在布鲁塞尔进行的艰苦斗争，直到将军最后和德国大使会晤，取得胜利时为止。

总理参加所有同德国人、美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谈判。他在总理府接见外国政府首脑和大使。对于国家元首没有能够去的那些国家，他去进行正式访问，向各国政府首脑阐述法国的政策。

戴高乐将军让蓬皮杜以最密切的方式参加制定对外政策的工作，在某些观察家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征兆。他们从中看出总统有把蓬皮杜培养成为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和继承人的意图。

在内阁会议上，总理善于把他一向对部长们的支持和维护将军的威信的努力结合起来，如果部长的报告引起争论，蓬皮杜便尽力替报告人纠正目标，若是还不能解决问题，他就绕过困难——事情留待以后研究——讨论下一个议题。

国家元首和总理合作的特征之一是对他们的共同工作保守秘密。乔治·蓬皮杜对任何人都都不揭露他和将军谈话的内容。他的助手和部长们有时等他从总统府回来等得多么焦急！可

是他带回来的只是官方决定的消息。

当乔治·蓬皮杜率领着他的第二届内阁和议会里的绝对多数派，在将军的庇护下，于1963年正式进入总理府的时候，他的公文包里并没有计划，帽子里也没有纲领。再说，他既没有戴帽子，也没有公文包。

他是怀着做点事情——做点脚踏实地的事情——的愿望上任的。他希望巴黎人有房子住，准备在首都建筑马虎、街道阴暗的东区建造新住宅区、摩天大楼、公园、林荫大道以及新的旅馆；改革司法和教育；开辟广阔的公路……

他说：“我召集了各种专家会议。我看见那些了解行政部门墨守成规的高级官员嘴边挂着怀疑的微笑……他们显然在想：又是一个新手，他还以为自己手里有魔术棒呢！”

“我未能在三年中做到我准备做的大部分事情。但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还能从事巴黎东区的改建工作。能够做到开辟塞纳河岸大道和延长里尔——巴黎——马赛汽车公路，我已经觉得很高兴了。法国是一个行动迟缓的古老国家，但是有了现在的青年一代，我们是可以好好地做番事业的。”

总理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创造未来的行政工作都抓在自己手里：例如“计划”，本土整治、科学研究、巴黎地区的调整、游览事业、社会发展……

再也没有比蓬皮杜对本土整治的态度更能说明他的工作方法的了。在建筑部的一系列的办公室里，许多参加实际工作的诗人、行政官员、建筑师和工程师正在塑造明天将变为现实的梦想。

土地整治是需要的，但当时还只不过是象女巫的魔法，既没有说服力，也没有资金。

乔治·蓬皮杜决定把它变为现实。他任命他的助理奥利维埃·吉夏尔为驻本土整治部代表。吉夏尔凭着他的冷静的外交手段，一定可以同现在还在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那位能说会道的先驱者很好地配合。

总理以他的现实主义和奥弗涅人特有的方式，作出了具体的规划，设立了支持土地整治的

基金。钱并不多，只有一亿七千五百万法郎。但是具有总理代表身份的整治人员插手各部的事务，不再被称做煞风景的人，不再是以远景规划为借口打乱正式计划被人讨厌的人了。如今，他们象圣诞老人一样来到各部，根据整治部的远景规划选择优先实现的计划：一条运河，一段汽车公路。请他们先垫一笔缺少的经费，让这些项目先行开工。总理总是力图建立合作关系而决不发号施令。他设立了地区经济发展委员会，以便各省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注意不使这些委员会成为政治性的议会，制造空谈的工厂，或者是进行竞选的场所。

蓬皮杜想象的整治人员不能像路易十四那样，仅仅满足于看看勒诺特尔的花园草图，而是计划的执行者。整治部的工作是脚踏实地的立竿见影的，如架设电话线，办技术学校、修建公路、建立工业区、设立高等学校。支持土地整治基金对这些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建设外省的庞大计划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打下了基础。

这是蓬皮杜的工作方式，埋头苦干的作风，只注重实际效果，不张扬，避免激起群众的热情。这种作风像一个企业的董事一样，让总经理去主持记者招待会和引起股东的兴趣。

与此同时，罢工也在不断发生。火车、公共汽车、地下铁道时开时停，分送邮件的工作陷于停顿，电流经常中断。

矿工们在矿井下面骚动，他们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煤黑子是战后提高煤炭产量的战斗英雄，他们一向是工资最高的工人，而现在是今不如昔了。现在工资增加缓慢，他们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由于电力、柴油、天然气、原子能的竞争，煤炭业没有前途。

矿工们有工会组织。1962年10月，约瑟夫·索蒂做了法国天主教工人矿工联合会书记，他来向工业部长诉苦，但没有得到部长很好的接待，部长也没有满足他们外发工资的要求。于是索蒂建议其他工会组织联合罢工。法国总工会决定罢工48小时。约瑟夫·索蒂决定无限期罢工。

那年冬天冷得厉害，寒潮持续了三个月，运

河都结了冰。存煤只有三天的用量。无限期罢工就等于让可怜的人们在熄灭的火炉边冻死，等于叫工厂关门。既然只有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的矿工要罢工48小时以上，那么48小时之后政府将征用煤矿。

总理接见各工会联合会代表。总工会代表对蓬皮杜说：“如果政府采取征用的办法，矿工们将服从，但问题不会解决”。

3月1日，97%的地方爆发了罢工。工程师们与“煤黑子”联合行动。48小时后，政府宣布征用煤矿，但矿工们拒绝下矿井工作。

由天主教徒发起的罢工震撼全国。没有什么比一生享受不到阳光的人们联合起来更能感动人心的了。洛林的铁矿工人也参加了，拉克煤气公司职工停止了工作。

蓬皮杜颇为伤心。矿工持续罢工将使那些为反对不公正待遇的原则作斗争的善良人受到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看到罢工暴露了“煤黑子”的悲惨境遇，蓬皮杜更加伤心。其实，任何地方也不缺少煤，国家完全可以不靠法国煤矿公司，没有这些公司，只会更有利。

总理在寻找解决办法。但是由索蒂提出的一切建议都被拒绝了。政府因为已宣布征用煤矿而陷入僵局。国家不能在矿工们表示服从之前取消征用的法令。

然而，“工人力量”的路易·博特罗在与总理会谈中替政府找到了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成立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工会组织之外的“社会贤达委员会”来正确地计算应补发多少矿工工资。

罢工五星期之后，工会于4月3日接受了社会贤达的建议：先补发5.6%，年底再补足11%。

但是“煤黑子”们还是拒绝下矿井，索蒂用尽了所有的权力强制复工，他还得去帮那些受到他们会员责备的总工会代表的忙。

蓬皮杜后来说：“我错了。”作为一个政府领导人，像他这样坦率是少有的。“我本来以为矿工提出要求是有合法理由的，但是专家们肯定地对我说：矿工们没有理由，他们已经和别人一

样增加过工资。其实倒是专家搞错了。在一片混乱中的国营部门的薪金谁也弄不清楚。应该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统计所发工资的总额，才能证明与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特别是与法兰西电力公司的职工比较起来，煤矿公司的职工确实吃了亏。

“我当时认为必须征用煤矿，也是错了。有人对我讲只有三天的存煤了，工厂将要关门，可怜的人们将要挨冻。

“各工会联合会向我反映的，不过是矿工们的要求，遥远的回声。现在当我要讨论国内某一系统的工人的问题时，我就注意在联合代表团里至少要有一个工人的直接代表。经验证明，基层的人比他们的工会代表要求更强烈。

“这次使人伤心的又毫无意义的罢工至少也有点用处，使我为了及时挽救法国的煤矿，任命了一位国务秘书来负责动力分配，包括煤炭、煤气、电力、柴油、原子能的分配。以后法兰西电力公司的发电厂将改为火力的发电厂。”

社会公正的统计能够使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得到好处。但是不等它公布统计结果，各工会就宣布工资应补发10%。突然罢工，使所有的公用事业一个接一个地陷于瘫痪，第一天巴黎地下铁道不通了，第二天，没有火车，第三天，飞机也不能起飞了。后来，邮件也没有了，然后，厨房里断了煤气……

成千上万的巴黎人，事先没有得到通告，被迫步行几公里去上班，然后再走回家。外科医生正在手术室开刀，突然灯不亮了。无数的旅客耽搁在奥利飞机场。

什么突然罢工，轮流罢工，真是天才的发明。极少数的专业人员轮流停止工作，既能使一项公用事业陷于瘫痪，又不致使大部分人因参加罢工而失去一天工资。几个电工在总站和地下铁道的电流开关前面袖手旁观，就足以中断交通。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不向飞行员报告当天的天气情况，飞机就不能起飞。学校的看门人同食堂的炊事员串通一气关掉校门，考试前夕就无法上课了。

要求是正当的，但是突然罢工激怒了群众。

信件象雪片一样飞向总理府：“必须结束这种滑稽把戏”。

事实上，这种示威也有它滑稽的一面。只消几十个人就可以和政府开玩笑，就可以证明“在专政下”国家已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总统和德斯坦部长都说：“这是繁荣的罢工！可是有些系统的工人分享不到繁荣的成果！”

经济繁荣是不可否认的。

秘密津贴使工资表完全失去了作用。

蓬皮杜说：“给我简单地计算一下。将法兰西电力公司、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公私合营的巴黎运输公司所付工资总额除以职工人数，再将这个平均数逐年作比较，人们会看清楚这个问题的。”

国家机关人员的待遇较低，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不公平，但是必须计算出来才行。

统计的结果说明，各企业的工资逐年分别提高6%、8%、10%。

对总理来说，发生争论时采取统计的办法是有好处的。它表明繁荣的法兰西电力公司的职工比其他公用事业的职工待遇要好得多。

总理同意发放补偿费。反对派在议会对他大声叫道：“大家都说今年是社会发展年，而你却要发放补偿费！”

他反驳说：“让最不幸的人向最幸运的人看齐，这恰恰是社会正义。”

补偿费并没有使所有不满意的人都满意。6月17日，巴黎工人不得不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回家，因为地下铁道罢工了。直到晚上九时半，街上还拥挤不堪。戏院、饭店和电影院都没有顾客。公私合营的巴黎运输公司的几个电工领班和电工发生了争执，这些领班认为自己每月960法郎的工资应该再增加20法郎，这样才能与下一级保持适当的距离。

许许多多的电话打到总理府：“这一次是滥用了罢工的权利！”

乔治·蓬皮杜使议会通过以前饶勒斯和朱尔·盖德要求的关于在公用事业中罢工权利的法案。停止工作须在五天前通知，并且要由有代

表性的工会联合会发出通告，也就是说，禁止突然罢工，轮流罢工。六个电工领班再也不能使地下铁道停止通车，必须由一个大的工会宣布罢工并且发出通告。

弗朗索瓦·密特朗说：“根据你们的法律，学校食堂的炊事员如果要提出她们的要求，就得请教师工会同他们一起罢教吗？”

“密特朗先生，如果炊事员要关闭学校的话，就得这样。”

在1961年4月的暴乱期间，戴高乐将军第一次立下政治遗嘱，万一他遇刺身死，即以普选的方式选出他所推荐的继承人。

总统把遗嘱封好后交给一位亲信。暴乱平息后，过了几天，这位亲信才把遗嘱还给总统。当时有人说，那时将军指定的就是乔治·蓬皮杜。当蓬皮杜拒绝留在将军身边工作之后，还仅是个银行经理，当时第五共和国的奠基者和他的前办公厅主任的关系还不十分密切。

从什么时候起，乔治·蓬皮杜被人看作是继承人了呢？

事实上，总理一上台，从他担任的仅次于总统的职务来看，他显然是在国家元首不得不突然辞职时代替国家元首参加普选的法定候选人。乔治·蓬皮杜是将军的左右手，毫无疑问，大家一致认为他是选民最熟悉的、最出名的戴高乐派，是戴高乐派参加普选的最合适的候选人，也是最有希望组成多数派的人。作为政府首脑，他是保卫新共和联盟及其盟友的当然领导，也是议会多数派的当然领导。

戴高乐将军认为蓬皮杜任总理是再合适不过了。只要将军不改变看法，他就会认为，万一突然蒙难，这位最合适的总理就是继续第5共和国事业的最适当的候选人。

保卫新共和联盟的一位领导人说：“我们很难想象，万一发生不幸，在戴高乐方面，除了乔治·蓬皮杜，还可能有谁当候选人。近几年来，没有一个人象乔治·蓬皮杜那样被将军经常推到水银灯下，推到前台，让他离开将军和保卫新共和联盟而独立工作，让他出人头地，也没有一个人象乔治·蓬皮杜那样享有那样高的威信，

同电视观众那样熟悉。”

从这些事实来看，万一国家元首突然离开总统府，继承人的问题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当将军的健康引起拥护者的忧虑和燃起敌对者的希望时，不少人出于稳定政权的愿望，希望将军仿效美国的做法在总统下面设立一位副总统，在危机和战争时期，就可以确保政权的稳定，免得总统突然逝世造成全国混乱，为冒险而混入临时举行的大选大开方便之门。

在“秘密军队组织”活动猖獗时期，这种愿望经常有人提起。忧心忡忡的戴高乐派所以希望有一位继承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宪法规定，国家元首出缺时，临时继承人由参议院议长担任，而当时任参议院议长的是加斯东·莫内维尔。他们认为，万一发生不幸，这位反对戴高乐主义的参议院议长在准备大选期间无疑会不遗余力来恢复第四共和国的政治的。

1965年12月总统大选来临时，设立副总统的建议又被提了出来。当时有人在想，将军可能不相信有比他自己更好的继承人来从事有待完成的伟大事业：在政治上统一欧洲。但是，将军再次当选后日趋年迈，也许不想再干了，和他同时当选的副总统可能完成总统的七年任期。在戴高乐当权14年之后，老的政治风尚已经过时了，旧政治制度的代表人物已经年迈，不再问事，新的反对派领导人也不再是重蹈第四共和国错误的人，尤其是老的政治结构，热衷于以往的吵闹的老人马也随着时间消逝了。

但是戴高乐坚决反对设立副总统。他说，未来的总统不可能有历史所赋予他本人的那种威望。在他庇护下当选的副总统不可能在国民议会面前树立起必要的个人威信。

在美国，副总统和总统先是一党选出的代表，然后才是国家的代表。由于一党取得多数而获胜，总统和副总统两人同时进入白宫。他们两人的威信是无可争议的，是建立在执政党的基础上的。法国人是意见分散的，不能采用美国的制度。

戴高乐从不喜欢身边有个碍手碍脚的可疑人物，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

1966年1月8日，戴高乐连任总统，蓬皮杜受命组织第三届政府。1967年3月，蓬皮杜第一次在康塔尔省被选为议员。

1967年4月6日，蓬皮杜再度组阁。他的第四届政府受到“五月风暴”的猛烈冲击。1968年5月2日，蓬皮杜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正式访问，但是国内学生运动高涨，局势急转直下，他于5月11日中断访问，紧急返回巴黎。这时戴高乐正在布加勒斯特访问。蓬皮杜竭尽了全力，企图挽回局势。5月19日，戴高乐从罗马尼亚飞回巴黎，严厉斥责各部长说：“六年来内阁无所事事，缺乏远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听了这番话，蓬皮杜当即递交了辞呈，但被戴高乐拒绝了。从此，他俩之间开始出现裂痕。戴高乐要求立即将被大学生占领的巴黎大学夺回来，蓬皮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戴高乐将此行动稍微推迟一点实行。蓬皮杜相信可以通过谈判，逐渐恢复平衡。5月27日，政府同支持学生的工会组织达成了格勒内尔协议，蓬皮杜想用满足工人的要求来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5月28日，戴高乐同蓬皮杜在相当紧张的气氛中会晤。次日，戴高乐总统不向总理打招呼就启程到联邦德国访问。30日拂晓，得知戴高乐已返回巴黎的蓬皮杜写好了辞呈，内中强调指出，总统在没有通知政府首脑的情况下就直接同军队接触（法国宪法规定，政府首脑负责防备，而戴高乐这次是去视察法国驻联邦德国的军队），这意味着总统公开对他表示不信任。当日下午2时30分，两位政治家进行会晤。戴高乐拒绝接受蓬皮杜的辞呈，并把他即将宣布推迟公民投票的电视演说稿交给了总理。

1968年5月31日，蓬皮杜组成他的最后一届内阁。在6月23日和30日举行的两轮立法选举中，左派惨败，戴派独自拥有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7月1日，蓬皮杜再次提出辞呈，戴高乐照例予以拒绝，但这次的态度相当温和。7月4日，蓬皮杜及其夫人在爱丽舍宫同戴高乐共进午餐，气氛十分密切。6日，戴高乐私下证实他将离开总统职位。蓬皮杜于10日又正式